




东方历史学术文库

明代南直隶方志研究

Researches in Nanzhili Local History
of Ming Dynasty

张英聘
◇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东方历史学术文库

明代南直隶方志研究

Researches in Nanzhili Local
History of Ming Dynasty

张英聘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东方历史学术文库》 学术评审委员会

主任委员 齐世荣
副主任委员 金冲及
委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于 沛 王小甫 王思治 邓小南
刘桂生 刘家和 阮芳纪(常务)
李世安 陈铁健 张振鹞
张椿年 经君健 郭松义
阎步克 谢寿光

《东方历史学术文库》 编辑委员会

主 任 沈志华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丁一川 张 丽 张 彤
李丹慧 杨 群 宋月华
陈东林 徐思彦 赵秀荣

《东方历史学术文库》书目

1994 年度

- 《魏忠贤专权研究》，苗棣著
《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高王凌著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河南冀东保甲制度研究》，朱德新著
《江户时代日本儒学研究》，王中田著
《新经济政策与苏联农业社会化道路》，沈志华著
《太平洋战争时期的中英关系》，李世安著

1995 年度

- 《中国古代私学发展诸问题研究》，吴霓著
《官府、幕友与书生——“绍兴师爷”研究》，郭润涛著
《1895~1936 年中国国际收支研究》，陈争平著
《1949~1952 年中国经济分析》，董志凯主编
《苏联文化体制沿革史》，马龙闪著
《利玛窦与中国》，林金水著
《英属印度与中国西南边疆（1774~1911 年）》，吕昭义著

1996 年度

- 《明清时期山东商品经济的发展》，许檀著
《清代地方政府的司法职能研究》，吴吉远著
《近代诸子学与文化思潮》，罗检秋著
《南通现代化：1895~1938》，常宗虎著

《张东荪文化思想研究》，左玉河著

1997 年度

《〈尚书〉周初八诰研究》，杜勇著

《五六世纪北方民众佛教信仰——以造像记为中心的考察》，
侯旭东著

《世家大族与北朝政治》，陈爽著

《西域和卓家族研究》，刘正寅 魏良弢著

《清代赋税政策研究（1644~1840年）》，何平著

《边界与民族——清代勘分中俄西北边界大臣的察哈台、满、
汉五件文书研究》，何星亮著

《中东和谈史（1913~1995年）》，徐向群 宫少朋主编

1998 年度

《古典书学浅探》，郑晓华著

《辽金农业地理》，韩茂莉著

《元代书院研究》，徐梓著

《明清高利贷资本》，刘秋根著

《学人游幕与清代学术》，尚小明著

《晚清保守思想的原型——倭仁研究》，李细珠著

1999 年度

《唐代翰林学士》，毛蕾著

《唐宋茶业经济》，孙洪升著

《七七事变前的日本对华政策》，臧运祜著

《改良的命运——俄国地方自治改革史》，邵丽英著

2000 年度

《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东周墓葬制度》，印群著

《中国地名学史考论》，华林甫著

《宋代海外贸易》，黄纯艳著

- 《元代史学思想研究》，周少川著
- 《清代前期海防：思想与制度》，王宏斌著
- 《清代私盐问题研究》，张小也著
- 《清代中期婚姻冲突透析》，王跃生著
- 《农民经济的历史变迁——中英乡村社会区域发展比较》，徐浩著
- 《农民、市场与社会变迁——冀中 11 村透视并与英国农村之比较》，侯建新著
- 《儒学近代之境——章太炎儒学思想研究》，张昭军著
- 《犹太民族史上的东方一页：一个半世纪以来的上海犹太人》，潘光 王健著
- 《俄国东正教会改革（1861~1917）》，戴桂菊著
- 《伊朗危机与冷战的起源（1941~1947 年）》，李春放著

2001 年度

- 《〈仪礼·丧服〉考论》，丁鼎著
- 《南北朝时期淮汉迤北的边境豪族》，韩树峰著
- 《两宋货币史》，汪圣铎著
- 《明代充军研究》，吴艳红著
- 《明代史学的历程》，钱茂伟著
- 《清代科举家族》，张杰著
- 《清代台湾的海防》，许毓良著
- 《清末民初无政府派的文化思想》，[韩] 曹世铉著

2002 年度

- 《唐代玄宗肃宗之际的中枢政局》，任士英著
- 《王学与晚明的师道复兴运动》，邓志峰著
- 《混合与发展——江南地区传统社会经济的演变（1990~1995）》，马俊亚著

《敌对与危机的年代——1954~1958年的中美关系》，戴超武著

2003 年度

《部落联盟与酋邦》，易建平著

《西周封国考疑》，任伟著

《〈四库全书总目〉研究》，司马朝军著

《1500~1700年英国商业与商人研究》，赵秀荣著

2004 年度

《后稷传说与祭祀文化》，曹书杰著

《明代南直隶方志研究》，张英聘著

《西方历史叙述学》，陈新著

《东方历史学术文库》 改版弁言

从1998年起，文库改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设立文库的初衷，“出版前言”都讲了，这是历史记录，改版后仍保留，这也表明改版并不改变初衷，而且要不断改进，做得更好。

1994年，面对学术著作出书难，由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毅然支持，文库得以顺利面世，迄1997年，已出版专著25部。1998年，当资助文库的东方历史研究出版基金面临调息困难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又慨然接过接力棒，并于当年又出了改版后专著6部。5年草创，文库在史学园地立了起来，应征书稿逐年增多，质量总体在提高，读者面日益扩大，听到了肯定的声音，这些得来不易，是要诚挚感谢大家的；而需要格外关注的是，我们的工作还有许多缺点、不足和遗憾，必须认真不断加以改进。

如何改进？把这几年想的集中到一点，就是要全力以赴出精品。

文库创立伊始就定下，资助出版的专著，无例外要作者提供完成的书稿，由专家推荐、采取匿名审稿，经编委初审、评委终审并无记名投票通过，从制度上保证选优原则；评委们对专家推荐的书稿，是既充分尊重又认真评选，主张“宁肯少些，但要好

些”；前后两家出版社也都希望出的是一套好书。这些证明，从主观上大家都要求出精品。从客观来说，有限的资助只能用在刀刃上；而读者对文库的要求更是不断在提高，这些也要求非出精品不可。总之，只有出精品才能永葆文库的活力。

出精品，作者提供好书稿是基础。如“出版前言”所指出的，开辟研究的新领域、采用科学的研究新方法、提出新的学术见解，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达到或基本达到这些条件的，都是好书。当然，取法乎上，希望“上不封顶”；自然，也要合格有“底”，初步设想相当于经过进一步研究、修改的优秀博士论文的水平，是合格的“底”。有了好书稿、合格的书稿，还需推荐专家和评委的慧眼，推荐和评审都要出以推进学术的公心，以公平竞争为准则。最后，还要精心做好编辑、校对、设计、印装等每一道工序，不然也会功亏一篑。

5周岁，在文库成长路上，还只是起步阶段，前面的路还长，需要的是有足够耐力的远行者。

《东方历史学术文库》编辑委员会

1998年9月

《东方历史学术文库》

出版前言

在当前改革大潮中，我国经济发展迅猛，人民生活有较大提高，思想观念随之逐步改变，全国热气腾腾，呈现出一派勃勃生机，举国公认，世界瞩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发展而尚待完善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也会产生一定的负面效应，那就是在社会各个角落弥漫着“利之所在，虽千仞之山，无所不止；深渊之下，无所不入”的浊流。出版界也难遗世而独立，不受影响，突出表现为迎合市民心理的读物汗牛充栋，而高品位的学术著作，由于印数少，赔本多，则寥若晨星。尚无一定知名度的中青年学者，往往求出书而无门，感受尤深。这种情况虽然不会永远如此，已使莘莘学子扼腕叹息。

历史科学的责任，是研究过去，总结经验，探索规律，指导现实。我国历来有重视历史的传统，中华民族立于世界之林数千年者，与此关系匪浅。中国是东方大国，探索东方社会本身的发展规律，能更加直接为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借鉴。

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对历史学科十分关心，但限于财力尚未充裕，资助项目难于面面俱到。我们是一群有志于东方史研究的中青年学人，有鉴于此，几年前自筹资金设立了一个民间研究机构，现为中国史学会东方历史研究中心。创业伊始，主要是切磋研究。但感到自己研究能力毕竟有限，于是决定利用自筹资金

设立“东方历史研究出版基金”，资助有关东方历史的优秀研究成果出版。凡入选的著作，均以《东方历史学术文库》作为丛书的总名。

我们这一举措，得到了老一辈史学家的鼓励，中青年同行的关注。胡绳同志为基金题词，在京的多位著名史学专家慨然应邀组成学术评审委员会，复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允承出版；全国不少中青年学者纷纷应征，投赐稿件。来稿不乏佳作——或是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或在深度和广度上超过同类著作；或采用了新的研究方法；或提出了新的学术见解，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百花齐放，绚丽多彩。这些给了我们巨大的鼓舞，也增强了我们办好此事的信心。

资助出版每年评选一次。凡提出申请的著作，首先需专家书面推荐，再经编辑委员会初审筛选，最后由学术评审委员会评审论证，投票通过。但由于基金为数有限，目前每年仅能资助若干种著作的出版，致使有些佳著不能入选，这是一大遗憾，也是我们歉疚的。

大厦之成，非一木能擎。史学的繁荣，出版的困难，远非我们这点绵薄之力能解决其万一。我们此举，意在抛砖引玉，期望得到海内外企业界，或给予我们财务支持，使我们得以扩大资助的数量；或另创学术著作基金，为共同繁荣历史学而努力。

《东方历史学术文库》编辑委员会

1994年9月

序

南炳文

案头摆放的这部《明代南直隶方志研究》，是张英聘女士将其在我名下攻读博士学位课程时所作论文加以修改而写成的。她的选题角度是值得肯定的。

中国的地方志内容十分丰富，诸凡一定区域的山川地貌、气象特征等自然状况，以及政治、经济、军事、民族、风俗、文化等社会人文情形，无不详加记述，为后人了解、建设该区域，提供了宝贵的参考资料。因之，研究和利用地方志，是不可忽视的一项重大课题。

中国的地方志，又是源远流长的。关于其起源，虽然众说纷纭，但其根于先秦当为专家的共识；换言之，中国的地方志已有数千年的历史了。先秦之后，中国的地方志日渐成长。到了宋元时期，其纂修趋于定型，体例渐趋完备。至明代，其纂修既继承了宋元的成果，又有所创新，从而达到了重要的发展时期。而到了清代，这一纂修更继续前进，进入空前繁荣的阶段。对于历史悠久的中国地方志之研究、利用，为了达到深入，显然

应当首先不厌其烦地就其各个发展阶段分别进行，而后达到通贯总体的准确把握。

众所周知，中国的幅员十分广阔，各个地区经济发展和文化进步的程度大有差别，这种基础条件，影响了方志的纂修。在同一个时期，不同地区的方志纂修状况，大有不同。这又使方志的研究，除了从时间的角度而就全国方志的各个发展阶段分别进行外，还应从空间的角度而就各个区域的实际状况分别着手。只有这样，才能弄清其真实情形，彻底把握。

张英聘女士的《明代南直隶方志研究》一书，正是既考虑到时期（明代），又考虑到区域（南直隶）而研究方志的，这是笔者肯定其选题角度的主要原因。另外，明代的南直隶，是其时中国经济最发达、文化最先进的地区，其方志的纂修，无论从数量来说，还是从质量来讲，抑或是从有关理论的完备程度来谈，都是走在全国各个地区最前列的。因此，明代南直隶的方志代表了当时中国的方志纂修发展的最高水平。这样，张英聘女士的这部著作实有助于探明明代方志纂修的最新贡献。这一因素，也是笔者肯定该书选题角度的一个原因。

《明代南直隶方志研究》一书，凡40余万字，分为十章，系统论述了与明代南直隶方志有关的许多方面的内容，包括明代南直隶修志兴盛的原因，以及明代南直隶方志的编修源流、编纂队伍、经费来源、种类、结构、内容、理论创新、史料价值、影响、历史地位等。

全书在史论结合的基础上，以总体分析与个案剖析交互使用的方法，透彻、雄辩地阐述了作者的研究成果。作者为写作本书，作了超乎寻常的努力，其所参考过的古今文献即包括正史政书类、笔记文集类、书目提要类、方志类、近人今人论著类等五类近四百种。本书不仅为读者提供了很多资料、知识，而且也包含大量的情报信息，如其总表一《明代南直隶府州县地方志编修情况统计表》，即准确介绍了明代南直隶四百多种方志的书名、卷数、纂修者、版本、存佚情况、资料来源等详尽资料，为作此表，作者搜集的范围几乎包括了全世界所有有关图书馆的有价值的资料。有这样的一部著作问世，对于人们了解明代南直隶方志的方方面面，无疑是提供了极大的帮助。就笔者的阅读所及而言，学术界关于明代南直隶方志的总体性专门研究，在这部著作之前，尚未见出现。由此说来，这部著作的问世，实为填补了一项亟待填补的空白。

任何事物都不会是尽善尽美的，《明代南直隶方志研究》一书也有其有待进一步提高之处，如明代南直隶方志与明代其他地域方志的比较研究似应再为加强。但瑕不掩瑜，大醇小疵。这部书总体上看不能不说是成功的。

研究明代南直隶方志，起码需要如下几个条件：熟悉明代的历史，熟悉明代南直隶的历史，熟悉中国方志史，具有扎实的学风。这几项，张英聘女士恰好无不具备。她在攻读博士学位课程之前，曾师从于中国人民大

学著名的明史专家毛佩琦先生攻读硕士学位课程，学习明史；又曾对明代南直隶的行政机构作过长期的潜心研究，对明代南直隶了解甚深；硕士毕业后在中国地方志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多年，使之对中国的旧方志状况掌握得如数家珍；而其青少年时期生活的家乡河北省广宗县，沙地连着碱地，自然条件极为艰苦，坏事变好事，艰苦条件促进了该县居民艰苦奋斗、踏实努力优秀品质的形成，环境风气的熏陶，使张英聘女士自幼养成了苦干求实、奋进不息的作风。《明代南直隶方志研究》这部功力深厚、学术价值甚高的开创性著作之出于张英聘女士之手，实非偶然。祝愿张英聘女士进一步发挥自己的优势，在已取得成绩的基础上，把自己的明代南直隶方志的研究以至关于整个中国古代方志的研究，更加提升一步，为学术的繁荣作出更大的贡献。

于天津南开大学

2005年4月16日

前 言

中国地方志总称方志，是记述一定历史时期一定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科学、社会以及某一领域诸方面状况的文献典籍，内容极为丰富，宋代史学家司马光赞之为“博物之书”^①，清代方志学家章学诚称之为“一方之全书”^②。方志源远流长，以其体例独特，信息容量大，并具有经世致用和存史等重要功能，被历朝历代的统治者所重视和倡修，构成中华文明与历史文化的重要资源宝库之一。

地方志究竟源于何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的主张导源于《周官》，据《周礼·春官·外史》云“外史掌书外令，掌四方之志”；有的主张起源于《尚书·禹贡》，认为《禹贡》是我国最早分地域记载各地方地理、物产、贡赋等情况的专篇；有的认为渊源于《山海经》，其所载既有风土人情，又涉人物世系；有的主张渊源于古代诸侯国史，如晋《乘》、楚《梲杙》、鲁《春秋》等；有的主张起源于《越绝书》、《吴越春秋》、《华阳国志》，认为这些文献多载当地掌故，是邦国史志之一种；有的则提出方志多源论，如《周官》之外还提到了《九丘》。《九丘》早佚，惟

①（宋）司马光：《司马温公文集》卷六十六《河南志序》，国家图书馆分馆藏，清同治五年（1866）刻本。

②（清）章学诚：《章氏遗书》卷二八，外集一《丁巳岁暮书怀投赠宾谷转运因以志别》，国家图书馆分馆藏，1936年刘翰怡编刊本。

《尚书·序》中称：“九州之志，谓之《九丘》。”因后世方志的发展与舆图也有千丝万缕的渊源关系，故有人主张方志起源于图经、风物志、风土记等。上述方志起源的多源论，反映出方志事业的传承延续，多方面汲取营养，不断发展、完善和丰富的历程，同时也说明方志纂修具有悠久的历史 and 传统。到宋元时期，方志纂修趋于定型和稳定，体例格式渐臻完备。随着内容的不断充实丰富，有了“旧志”与“新志”的区别，出现了“新修”、“续修”、“重修”、“增修”等名目。

明代继承宋元修志的优良文化传统，予以发扬光大。明代方志无论从内容到体例，还是从编纂原则到修志理论的形成，都超越了宋元时代。在继承与创新中，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现存的明代方志，保存了大量的珍贵史料，为明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族、社会生活、对外关系等方面研究领域的拓展，区域史和专题史研究的深入，提供了丰富的史料。

利用方志进行研究，是近年海内外学者比较关注的视角，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如葛剑雄主编、曹树基撰《中国人口史（明时期）》（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9月第1版），就利用了数百种的方志资料进行人口研究；日本的谷口规矩雄撰写《明代徭役制度史研究》（东洋史研究丛刊之五十四，日本东京同朋舍，1998年2月出版发行），也注意对明代方志的利用。常建华《明代宗族祠庙祭祖的发展——以明代地方志资料和徽州地区为中心》一文（载《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二卷，天津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版），利用明代方志资料，对明代祠庙祭祖礼俗、徽州宗祠的发展进行了考察；常建华《明代方志所见岁时节日中的女性活动》一文（载韩国《中国史研究》第20辑，2002年版），通过明代方志的记述，透视女性的活动。王薇《从方志看明代直隶学田》一文（载《中国地方志》，2004年第5期），利用方志资料，分析了明代直隶学田的设置与发展、基本特征及其历史作